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汪精卫

（1926 年 1 月 6 日）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要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所经过的政治状况，作一个总报告。这个时期当中差不多是两年，在这短少时期所能报告的，只是一些重要的事件，而且关于军事方面尚有蒋介石同志报告，财政方面有宋子文同志书面报告；不过说及政治，不能不连带到军事、财政方面，不说到便不能明了。所以兄弟今天所说，也要把关及军事、财政的说个大略。

这两年中政治状况，可以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第一次大会以后到总理北上奋斗，就是由 13 年 3 月至 11 月。

第二个时期是从总理北上奋斗到总理逝世，这个时期很短，但关系却甚大，就是由 13 年 12 月至 14 年 3 月。

第三个时期是从总理逝世一直到现在，就是由 14 年 3 月到 15 年 1 月。

先说第一个时期：自从第一次大会发出宣言，说明中国之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状，解释三民主义之真谛，并决定了最低限度的政纲，大会闭会后,自应该遵照政纲去实行。但可惜那时种种障碍都还未除去,党的最高权力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理当时要把军事上的同志都加入在内，所以如杨希闵、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都任为中央执行委员，如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都任为中央监察委员。总理之意是想将军事上的同志合拢起来,实行大会的种种决议案,使大家能真实在主义之下共同奋斗。不料这个意思却绝对不能实现，杨希闵、刘震寰都在广州有最大的军事上的势力，却都不愿意真心实行总理的主义的。其时许崇智同志还在上海，至 3月后才回广州，谭延闿同志孤军驻在北江，后来以出发东江受杨希闵军队之压迫，生存尚且不敢必，更何从说到发展。虽然由总理召集各将领开过几次军事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提案，到底亦是阳奉阴违，绝无办法。一次总理见得湘军太痛苦，十分受不住了，他们当时有四句很伤心的话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不得埋。”但刘杨部下却盘据要津,把全省财政通通拿在手上,简直不肯放松一点给湘军可以生存。记得有一天，总理在军事会议席上有过十分沉痛的话,他说“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回到广州,正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 后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东，自誓要实心拥护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 可是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当时杨刘诸人听见了这话都说“大元帅今天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都服从你就是了”。总理因此才提出财政统一的办法。这个议案当时是一致通过了，但

后来一点没有实行，各军依然是就自己势力所能及的，就随意抢收分割了去，到底是毫无办法。到 9 月 13 日，总理决定北伐，委廖仲恺同志做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又兼广东财政厅长，把财政全权交廖同志一人负荷，总理就和谭延闿同志出发到韶关。当时廖同志有一个通电是很沉痛的，电中说及广东的财政情形，如果各军都肯捐除私见，则拿现在的收入借给各军是很够的；如果各军仍旧是任由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随意剥削人民，则必至军队不能打战，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穷苦。这电的目的在劝各军交还财权，各军也跟着发出许多响应的电，但却止是一个空言，没有一个人肯交一个钱出来。廖先生因此亲到韶关，再见总理，说明在这个情形之下，叫他做财政当局也是无用的，不特不能实行什么财政计划，就想筹一点饷也是没法的；与其使他做财政当局，不过是空替大元帅多担一个恶名，不如准他辞职，还容易使人民知道不法军队把持的罪过。廖同志因此就不做财政当局，专在中央党部办理党务，并任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实心从事政治训练的工作。这时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是这样情形，简直是万事都无从办起，与第一次大会以前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但自从蒋介石同志受总理命令组织陆军军官学校以后，和廖同志及各同志用很大的精神替革命事业打好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此事蒋介石同志另有报告，此时不必详说。此外还有两件大事也于革命事业的基础有极大的关系，而且和军事是联络在一起的，一是外交方针；一是农工运动。农工运动中央党部另有报告，如今把外交方针叙述一过。

要叙述外交方针，必要补说总理联俄一切的经过。本来总理致力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既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便不能不取销不平等条约。既要取销不平等条约，便一定要问到这些不平等条约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由此推究，即知从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英法联军后的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一直到庚

子联军后的辛丑条约，以至民国 4年的日本二十一条件，都分明是帝国主义者之作祟。故此反对帝国主义，实是总理的、亦即本党的向来目的。不过在辛亥革命未成以前，却未曾明白提出取销不平等条约这一个口号，到民国元年 1月 1 日，总理就职临时大总统宣言才说出"：吾人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同时要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 " 这两句话，实在即是取销不平等条约的真义。不平等条约的罪过，就是要中国单尽义务而绝无权利；所以那时虽没有明言取销不平等条约，但单这两句话说起来，已很惹起外人的注目了。民元 2 月，总理辞职来到上海，赴过一次租界外人的欢迎会，就已经直白说过，他所要求于各邦人士的，是要把租界交回我们中国；这可说是中国取销不平等条约的第一声。但从这日起，外人的报纸便开始讪笑总理，决心帮助袁贼世凯去反对中国的革命党了。外国帝国主义者更答应袁贼的大借款，因此才有民二东南的战事；袁贼即利用大借款以扫平东南几省的革命党，因此有民五的洪宪帝制；因此才有民六日本再利用段祺瑞给以参战借款及各种借款 3万万以维持日人之二十一条件。此时可说已是革命党与帝国主义者短兵相接的时期，无法而可以避免的了。民六俄国革命既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攻击苏俄，诋之为过激，诬之为地狱；但那时总理便说俄国革命必定成功，欧战中的同盟国、协商国都一定失败,民七总理在广州辞去大元帅职,复回上海,因为深恨帝国主义者之日日把苏俄造谣，曾打一个电与苏俄，庆祝他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去奋斗。其时世界上的交通机关都在帝国主义者的掌握，电报是不易打去的，很曲折的才托美洲的华侨同志打给俄国。列宁此时正在帝国主义者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总理这一封电，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总理与俄国的同志虽然在欧洲亡命时也曾有会过面，彼此讨论过革命的事业，知道他们的旨趣，但打电致意，却以此为第一次。

到民九、民十间，苏俄已经打破了帝国主义者的封锁，能够

用其余力来帮助世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列宁更决定了两个计划：（一）对西方的被压迫阶级，助他们联合起来；（二）对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也助他们联合起来。他派到东方的同志有一个叫做马林，马林在民十曾到广西，总理当时正在师次桂林，马林去见他，总理当时曾打一封电到广州给廖仲恺同志和兄弟两人，说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深信他建国方略里的实业计划，一定能够实行；并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这便是总理联俄的起点了。可是马林由桂林来到广州以后，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为除掉俄新经济政策与总理实业计划暗相符合这一点，觉得高兴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对陈炯明与本党的组织方法、宣传方法都表示失望，并且他断定香港帝国主义者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与总理一定不能相容。这些话他对廖仲恺同志和兄弟都一样说法，对别人如何说则不得而知。是时中国共产党曾和吴佩孚有过来往，马林也曾去见吴，他说吴的才力比陈炯明高过十倍，但可惜他总不懂什么是政治。兄弟因此联想及以前曾有一部分同志批评李大钊同志不该和吴佩孚来往。须知道在那时候李还未加入本党．他拿共产党员资格与吴来往确是有的，他想用吴帮助共产党做国民革命事业，这也是革命党常有之事，有什么可以反对。一直到民国 11 年 6 月 16 日以后，总理蒙难广州，8 月 15 以后亡命上海，其时中国共产党员很替总理抱不平，才陆续来加入本党。最先加入本党的就是李大钊，由张继介绍来的。李当时曾对总理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不知总理能否许可接纳他。总理答他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便多起来了，后来苏俄又派越飞到中国，他到上海时曾见总理，并且曾联合发表一个宣言，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都承认中国现在最急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不久越飞因为抱病，由上海到日本东京，总理命廖仲恺同志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 12 年春间,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做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其中实有原故的。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夏间，总理更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蒋同志到莫斯科时，列宁已经病重；但也见过托洛斯基诸人，经过一番切实的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后日回国改组本党和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国携手了，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俄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非帮助本党不可，非帮助总理不可，因此才派鲍罗廷先生来到广东。其时正当陈炯明、林虎的军队陷了石龙，攻到广州近郊，用尽了滇桂粤湘鄂豫诸军才把他打退，鲍先生到粤后，与总理商量许多，才决定改组本党，因此才有 13 年 1 月本党改组之事。可惜的在第一次大会时，恰正接了列宁逝世的凶耗，总理当时甚觉悲痛，曾停会两天志哀，并亲自出席追悼列宁大会，演说他哀悼列宁的感想。大家须知，这时各国还没有一国承认苏俄，虽然第二国际的首领麦唐纳正在初就英内阁总理之职，但和苏俄还未有恢复国际的关系，而我们广州的革命政府却已明白为列宁开追悼会了。其后俄国复派加拉罕到中国，商量中俄协定事情，苏俄当时本也知道如果和广州商量，这个协定很可以使中俄关系更加明了，但我们的政府尚在实力未充，即使订定也效率很小，所以不能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量，只要确实的取销一切不平等条约，便和什么人订定也都是于中国有益的，因此加拉罕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订定了中俄协定。其时兄弟刚奉总理命令到北京去，和同志商

量进行北方党务，曾和加拉罕谈过，他直说他也晓得曹锟不能代表中国的，不过利用曹锟现在的地位，商定了中俄关系，把从前俄皇时代订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通通取销，先把此事作一个结束而已。中俄协定成功后，更使本党与苏俄的感情又深一点。但因此同时更受帝国主义者的污蔑，他们见得本党联俄，无法破坏，就在上海、天津、香港各地的外国文报纸日日造谣，犹以为未足，更想到利用实力来破坏，因此遂有是年 10月 15 日商团之变。此事原委：因为 8月 1 日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由粤汉路管理许崇灏介绍到军政部领到一张买枪的执照，此照发出之后不到 4天，大批枪械便已由挪威船运载入口；总理当时非常震怒，因为各国卖给军火与中国人民，必须先得到中国政府之许可，才可以订立合同，如今领到执照止是 4 天，枪械便已入口，显然是老早交易妥当，且已经运到，不过等候骗到执照，才火速进来。所以总理便把枪械扣起，并且从严查究。但因此便引起商团之罢市，英国帝国主义者竟敢公然于 8月 27 日致一件类似哀的美敦的通牒给我们的外交部，说是听闻我们已定开炮攻打商团，如果是事实，英国的海军司令官也就命令舰队开炮攻打我们的官吏。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实是同等的国耻；以总理之志气，此时更愤到不可言状了。可是因为当日的环境太恶，也不得不要对于商团委曲求全，这也并不是因为怕外人的势力，实在因为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这班骄兵悍将已经和商团勾结，不肯奉总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团，而商团因为恃在他们有两个后盾：（一）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二）是我们政府统治下的骄兵悍将。晓得我们一定不能打他，因此才有 10月 10日的惨案，商团挟持枪械，把双十节徒手巡行的学生、农民、工人肆行屠杀，连死及伤至有数十人之众，政府至是不能更忍了，只得把自己尚能调动的军队如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樊钟秀的豫军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合拢起来，于是月 15 日才把商团打倒。因为打

倒得很迅速的缘故，到后来商团派人到港要求港督出兵，港督说：“已经完了,来不及了。”这便是商团勾结帝国主义来推倒革命政府的一段故事。商团之所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所以利用商团做工具，固然因为总理以联俄为外交方针，故不惜百端破坏；然农工运动之主张，早已于第一次大会宣言中解释明白，是年并曾开过实业讲演会,说明了总理的实业计划和本党的政纲,一面帮助农工，一面也保卫商民，不用说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两项政策,于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什么不利,而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正是对于经济落后的现象为对症发药。无如那些土豪买办，却着实冥顽不灵，认为这就是过激，这就是大逆不道；其冥顽不灵的状态，恰如从前官僚绅士反对民主制度，认为犯上作乱一般，遂至不恤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反噬革命政府。当时革命政府外则受帝国主义之欺侮，与北洋军阀之压迫，叛军之侵扰，内则受骄兵悍将之牵掣，土豪买办之毒螫，真真是重重迫胁，几乎窒息。在此时期，本党除了忍辱负重，准备一切革命的工作以外，实无何等表现。是为第一个时期。

现在要说到第二个时期了：这个时期是由总理北上起至逝世止。总理北上之目的，当时很多人以为总理是要和军阀合作，和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去分政权，这是错的；但是总理也知道国人会有这种误会，故此到了上海之后，便邀上海全体新闻记者谈话，说道：“我这次北上是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由这一段话看来，就可知道总理北上之目的是早已决定的了。当时总理还说道：“我负着这个责任北上,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随后总理并且曾到日本,要求日本民众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帮助我们中国革命，取销不平等条约，所有议论都载在《孙中山先生经过日本之言论》一书，不必详细报告。原本总理到上海时已受租界外人的压迫，后来由日本到天津，法

领事竟不许总理通过法租界，更不许在法租界住。北洋的军阀因此便说总理在外交上的感情不好，不知道总理的主张和帝国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当然会引起的反动。记得当时张作霖也曾和兄弟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要和孙先生要好的。”当时我答他说：“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呢？因为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要好的。”张作霖至此，见语不投机，便不再说了。因为他们这时正在和外交团商量，把尊重不平等条约做承认临时执政的条件。到 12 月 14 日，许世英、叶恭绰两人到天津见总理，总理这时的病略好一点，就问他：“听说临时执政已经接受外交团尊重不平等条约的通牒，是不是呢？”许、叶两人答：“是的。”总理当时便很生气，说话也比平常洪大而急促，我劝总理不必再多说话，总理才对我说：“你和他们说去罢。”总理在这时候，虽然是病，从未有发过热，自从听了段祺瑞接受外交通牒这一段话，着实生气，是晚便发热起来。固然总理所患的病是肝病，大家知道是不治之症，但当时病的加重，可以说是实在因这一气的。后来我和许世英、叶恭绰两人说：“取销不平等条约这事，原不只是孙先生的主张，自巴黎和会就已经提出；后来因为巴黎和会会长克里满梭说，这事不是巴黎和会所能解决的，可以留待将来国际联盟去解决，所以和会才把这案保留；以后到华府会议，我国还是提出的。这是全国国民的运动，你们单是要弄稳一个执政的地位，并连这件大事也轻轻去掉，如何做得？”他两人问我怎样办？我说：“你们执政覆牒可以说，外交团的来牒暂时可以承认；但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是全国民众的要求，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现在执政正和广州革命政府的领袖孙先生合作，孙先生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为当务之急的，执政当然同意，并

且要帮助的。’如此可谓最低限度的让步了。许叶二人都说“好，我们就这样告诉执政，这样办罢。’是晚我们把此事报告总理，总理说且看他们怎样再算。谁知他们后来对于此事竟没有办到。 12月31日，总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当时总理是打算病好再来奋斗的，不料段祺瑞此时却主张召集善后会议，以替代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议。总理为委曲求全起见，于 14年 1月17日通电(就是令人注意的筱电)，主张善后会议应加入职业团体代表，以为如果达到这个目的，即是有真正的民众主张在内，则我们的预备会议的主张，也可以退让 雒知段祺瑞对这一点也没有诚意，所以总理才吩咐党员不许加入善后会议。到 1月26日，总理的病愈重了，其时就有一部分的不肖党员，不遵党的决议，加入善后会议；至于冯自由、江维藩等又组织什么同志俱乐部，不惜变节卖身，以达他升官发财的目的，这班人还说我们利用总理的病以破坏孙段合作呢。以上就是总理和段祺瑞绝交的原因。总理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虽然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不能实现，然一般民众却已为总理的人格精神所感化，一致拥护此两大主张。所以总理逝世之后，北京民众有空前的追悼。五卅以来，各处反抗帝国主义之高潮及最近北京倒段之大运动，都是总理所播下的种子；总理虽然赍志以没，然其成功已不远了。

如今更说到第三个时期：自从总理北上以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又想作怪了。本来总理当出师北伐的时候，已经早把围困惠州、并驻扎石龙的军队撤退，希望陈炯明也捐除成见，向福建方面进展。但陈炯明却反因此天天造谣，说某日解惠州之围，某日克复博罗，某日克复石龙，到后来晓得总理病重，更加欢喜，一面联络滇桂军做内应，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勾结曾毓隽一班人，要求段祺瑞帮助他攻打广州，因此才有去年 2月间陈军攻广州的事情。此时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担任保障北江，许汝为、蒋介石、廖仲恺几个同志出发东江，原约杨希闵、刘震寰

共同担任破敌的；无如杨刘袖手作壁上观，遂不能不单独作战，卒把陈军驱逐出潮汕以外。这事末始，蒋介石同志当有报告，故不多说。自从东江平定以后，就发现杨希闵、范石生等与林虎来往的函电，知道他们通敌的情形，这是陈铭枢旅长攻入兴宁以后，在林虎的司令部内找着的；此外更发觉了刘震寰亲到云南见唐继尧，叫他派遣云南军队攻打广西、直下广东的密谋，一路龙云带兵从百色入桂，一路由唐继尧带兵从桂林入桂；杨希闵却驻香港与帝国主义者勾结，更和广东的劣绅买办勾结，叫他们打电给北京政府，推戴他做广东督理。这般的阴谋毒计，已酝酿成熟，当时留在广州的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觉得非常痛心，便派人到汕头和许、蒋、廖诸同志商量，决定推倒杨刘的计划。关于军事的动作，也留待蒋介石同志报告，现在所说的只是政治上的设施。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单是打倒杨刘，而民国 12 年来的恶化政治不能根本改造，也是无用，所以在去年 6 月 1 日由中央委员会定了一个严重的决议案，大致说明我们欲整顿中国，必先从整理广东入手；而整顿广东，又必先从整顿军事入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都受本党政治的训练。这决议案定了之后，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胡汉民同志立即接受，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下了实行的决心，再由兄弟到汕头见许、蒋各同志报告一切，大家都以为这决议案无论如何要尽力使之完全实现，所以 6 月 5 日以后，便开始攻击杨刘。6 月 12 日，杨刘打倒，我们便着手于国民政府之组织，大家有过极重要的商量，就是议决采用委员制。这个意思本来不自此时才有的，自去年 1 月 26 日总理入协和病院以后，在北京开过一次政治委员会会议，大家的意思都是主张在总理逝世以后要实行委员制的，和在广东政治委员的意思都是一样。因为总理在时，在本党有这个总理，同时在本国有这个元首；总理逝世以后，实在再无人可继，而且在本党总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说明是：“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并不是说本党设总理一人的。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本党总章草案原没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为总理决心改组本党的意思，实在要把党的责任交付给全体同志；但大会各代表都请求总理加入第四章，就是关于总理的那一章，因为总理是有很长久的历史的，中国的革命事业自开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领导，故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总理逝世之后，本党不复有总理了，推之以党治国的理论，则国家亦不复有元首了，而且就现在世界来说，也推委员制为比较好些；总理若在，大家都愿意听他的独裁，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承继他的,则委员制实为适应时势的要求。可是决议以后，为什么许久还不实行呢？就是因为其时杨刘还盘踞广东，如果即时实行，他们一定有份列入委员，岂不是又把我们彻底改造了的计划通盘弄坏？故此直到 6 月中旬杨刘走后，才提出实行委员制这个问题。我们正想趁这个时候从事种种建设，不幸于 6 月 23 日又有沙基的惨案发生，那天我们的民众止是一个巡行，是响应五卅上海惨案及汉口、九江各地惨案的巡行，实在毫无挑衅的意思；现在有些帝国主义者说我们首先开枪，但试想我们如果有挑衅的意思，断不至于将巡行群众都作密集队伍，凡是稍有军事常识的都不会有这样做法。故此我们挑衅之说，不待辩而自明了。但是帝国主义为何又向我们挑衅呢？我们敢断定：这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国民众的一种示威。我们打倒杨刘不过旬日,便遇着这样的帝国主义的示威，真是最危急的时候了；我们那时是准备着牺牲的，就是失败也不及计的，所以 7 月 1 日国民政府便宣告成立,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把国民政府的委员会组织妥当；二是把军事委员会组织妥当，把各种地方军的名目通通取销，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因为总理遗嘱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就拿国民革命四字做军队的名称。我们做统一军政的计划，做统一财政的计划。至于民众方面，我们努力帮助香

港罢工的工人，共同对待帝国主义作一个极大的反抗，这些都是 7 月 1 日以后我们所做的事。可是我们一面努力，敌人却也一面给我们很多的障碍，香港政府对于国民政府更出尽诸多方法去破坏，他们以为国民政府一倒，罢工便不能持久；同时骄兵悍将也在反对军事统一的进行，如魏邦平、梁鸿楷等就利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以从事反动。本来在 5 月底、6 月初的时候，蒋介石同志已率兵由汕头、经海陆丰以赴平山、淡水，许汝为同志尚在汕头，魏邦平去见他，张国桢带杨坤如也去见他，商量两个条件：（一）由魏担任联络粤籍军官，一致拥戴许同志；（二）由张担任联络叶举、熊略、洪兆麟、林虎等一致拥戴许同志。当时许同志以为他们真正要拥护他，便受了他们的要求，叫魏回到广州帮助粤军攻打杨刘；杨刘既倒，又叫莫雄带领全旅送杨坤如回到惠州。当时守惠州的骆凤翔，本来派人到大本营输诚，许同志吩咐莫雄与杨坤如同守惠州，实是还不能相信杨坤如的，所以特叫莫雄监视着他；谁知莫自送杨到惠州后，便调他的全旅开回石龙，然后自己回到广州见许同志；许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在惠州？他答既然总司令相信杨达波，便不要监视他；许同志也没奈他何，实则莫之与杨是早已约定的了。至于他们所以说排斥客军，因为其时蒋介石、谭组庵、朱益之几位最努力的革命同志，都不是广东人，故此仿出此等口号来排斥他。其实此等口号还是假的，他们实因为要保持往日割据地盘、霸收税项这种势力，如今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将要实行军事统一、财政统一，他们骄兵悍将的运命就要完了，所以他们就决定非推倒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不可；排斥客军便是一种推倒的方法，因为如此便好藉主客之见，实行拆台。此外和一般贪官污吏互相勾结来共同作祟，因为国民政府以廉洁做表率，以实行民政统一，此于贪官污吏又是大不利的。兄弟当时曾说过：“如果民政不能统一，固然是广东之祸；但如果仍容那些贪官污吏存在，则民政统一不过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更好机会。”他们听了这

些消息，更不得不着急起来。我们一方面决心努力实行本党各种议决案，他们一方面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便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来实行破坏。当 8 月初间我们已接有报告说：文华堂一班人已经决议要杀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但因为没有凭据，只能加以防范；廖同志曾说：“我们天天同民众接近，如何防范得许多,止有听他来便了。”及至 8 月 19 晚上，政治委员会会议散后，廖先生对兄弟说：“你现在仍是照常一个人出入，未免太疏忽了，要找些卫士才好。”兄弟说：“我是一个党员，此次才以中央执行委员列席国民政府委员会，就带卫队出入，是不好看的；而且你也没有卫士。”他说“:我这两天已预备了三个人了。”他并且笑着说“:听闻人家要用手机关杀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机关枪却新鲜得很。”不料到第二天 8 月 20 日早上，廖同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果然就给六七个凶徒乱枪打死，凶徒陈顺给廖同志的卫士打伤，当场捉获，在他身上搜着手枪及证据多种，这件案才找出个头绪。查得这支手枪，实是朱卓文常用的，所用的子弹果然是手机关子弹，廖案的全部，将来结束时，当有更详细的报告，现在不过说个大略。在廖案发生的当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开过一个联席会议，指定许汝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对政治、军事、警察有全权办理。当日晚上，我们三人正在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办公室商量应付时局方法，梁鸿楷在室外直对吴铁城同志说：“现在政府派许、汪、蒋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是很妥当的，听说廖仲恺之死，完全因为主张共产，朱卓文果是为反对共产而打死廖仲恺的，怕什么不敢承认，承认出来看看，有没有人替他帮忙，请你告诉特别委员会三位，此案还是松一点好。”吴铁城当时听到这话十分惊讶，不久就来见我们，把这事照直报告我们。由此知道此案关涉甚大，不止是文华堂一班人了。而二十一二等日接得报告：文华堂一班人胡毅生等连日晚上去魏邦平家里会议，夜深方出。23

日李福林军长特来见许同志说：“现有一事不能不来报告，因为胡毅生告诉我，现在党军已由粤汉铁路开向河南是要来打福军的，你们须准备才好。同时并有一个证人到来，他可以作证，说 8 月初间曾在文华堂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朱卓文和林直勉坐在一处，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当时以为他们是随口乱说的，不料他们真做出来。”我们得这几种报告，知道事已紧急，便即于 24 日晚上下令捕拿文华堂胡毅生、林直勉一班人。当拿到林直勉后，由检察委员会问他，他总不答。我们因他是一个老党员， 11 年 6 月 16 日曾救总理出险，所以从优看待他。有一日检察委员亲到他房里同他说话，一个人造事要敢作敢当，你既造了，何必不说？他才说：在检察委员会问我，我是不说的；如今既然到房中来问我，我便说出来。他遂写了十几张的供词，如今还存在廖案审判委员会。供词中直述：推倒廖同志是他向来的主张，但谋杀一事却没有知道，他绝不想到要推倒廖同志的结果就即是要杀廖同志，因为廖同志是肯负责任人，愈有人攻击他，他愈是要干的。受人攻击就即行引退的，可以用空气来推倒他，如廖同志这种人，想用空气来推倒他是没用的，其结果非把他杀死不止。供词中还有一段话是说当他参预推倒廖同志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这事是一定成功的，香港方面可以有 200 万元的帮助；林直勉听见这话，很觉得不安，以后就托病不再管这事。这算是林直勉尚有良心。香港 200 万元这句话，实和当日拿着的杨锦龙的供词是一样的；杨曾供出他当初本不敢参与这事，后来胡毅生说香港有 200 万元的帮助，他才决心参与的。可见此事是很确实的了。至于胡毅生被党军到宅逮捕时，当他对兵士诡说：毅生现在胡汉民同志家中，兵士受骗，立即到胡汉民同志住宅，几乎累着胡汉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机跑了。胡汉民同志知道有此意外之变，非常痛心，因为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来听他的话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于外间对于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已证明都是假的。以上所述是 25

日捕拿文华堂一班人的事，所可惜的只拿着林直勉，其余胡毅生、林树巍、魏邦平诸人都拿不着，我们在 25 这日还又拿了张国桢、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一班作恶的军官，并解散了他们在省的部队。梁鸿楷、杨锦龙的罪状，上头已经说过；梁士锋绰号梁土匪，和杨锦龙是一起的。这几个人拿了之后，张国桢便来见许同志，说他对于此事早已晓得，两星期前，魏邦平、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曾在他家商议如何推倒国民政府，并连许同志也要推倒，当时他劝他们不可推倒许同志，以致失了主脑等语，许同志以为张国桢现这样说，总还不是与谋的。蒋介石同志则以为张国桢做建国粤军第五师师长，既然在两星期前知道此事，如果早来报告，便不至闹出如此大祸，于今才来报告，显是明知梁杨梁诸人被拿，故急来卸脱，而且既然在他家会议，如何不算与谋？这等人倘不拿，那里还有国法？于是便把张国桢拿了。兄弟对于此点，与蒋同志同意。以上所述，是捕拿一班作恶军官的事。梁鸿楷被拿之后，兄弟等随命李军长济深前赴江门将梁鸿楷所部妥为处置。兄弟等办理此事，颇受外间一班人的攻击，究竟办理得当与否？还要求大会的评判。不过也要要求大会明白，如果当时不这样认真办理，则国民政府必已为一班反革命分子勾结帝国主义所推倒。他们的督理省长都早已预备好的了，当时虽然因为这样办理镇压了去，然廖同志已死，不可复生，这实是本党极大的牺牲。各位代表如果赞成兄弟的提议，请起立致哀。（当时全体代表皆起立致哀，廖夫人何香凝同志痛哭，主席谭延闿同志及报告者汪精卫同志皆泣下。）

自从 8 月 25 日以后，广州的形势更严重了，陈炯明的军队在东江方面有卷土重来之势，重征东江已是刻不容缓；可是广九铁路沿路有郑润琦、莫雄、许济等屯驻共有三师之众。郑润琦原是魏邦平的旅长，在广宁勾结土豪，残杀农民，是一个反革命的粤军师长；莫雄和杨坤如有联络，上头已经说过。9 月中旬，陈炯明

的军队已由海陆丰长驱直进，冯轶裴和余鹰扬都已陆续退至平山、淡水，在这种严重形势之下，如果蒋介石同志统率党军出发东江，必须经过广九路，郑润琦、莫雄已经约定：等他经过，立即截断他的归路，杨坤如坚守惠州以当其前，熊略、叶举、洪兆麟、林虎分路并进，党军虽然善战，究竟前后受敌，进退无路。各位想想：这条计策狠毒不狠毒？幸而在那时候，郑润琦、莫雄的叛迹已渐渐暴露，而许济部下之谭曙卿、陆瑞荣等同志都是深明大义的，他们说道：“如果政府不用他们，就此遣散好了；若是还用他们，他是不能和郑润琦、莫雄这些反革命派在一起的。”蒋介石同志因此便和兄弟商量，决定办法，并在政治委员会开秘密会议通过，下令把郑润琦、莫雄所部一律缴械。这是 9 月 20 日的事。许汝为同志见得所部军队这样不肖，气忿极了，便提出辞职，径赴上海。以上所述，都是事实，无论许同志在这里与不在这里，兄弟都是这样说的。9 月 20 日以后，原本可以出兵东江了，但不幸又有熊克武的事件。本来去年春间，陈铭枢旅长攻破兴宁时候，在林虎司令部里发见了 13 年冬间但懋辛写给林虎的一封信，信里所说都是联合滇桂军反对先总理的话。但懋辛是熊克武的死党，又是奉熊克武的命令来广州的，原来却摆布出如此的阴谋，所以去年夏间熊克武有电来说要携带所部就食来粤，我们听见已经是不放心了；不过因他也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正受赵恒惕的压迫，不能不勉为收容，且以为他经了这番挫折，也许有些觉悟了，所以便指定连县、连山、阳山这几县给他驻扎。这几县原是朱益之同志部下的驻地，我们请朱同志让给他的，他以为三县还不够，又将乳源给他；朱同志部则退至四会、广宁，所有这几县的收入都给他造军需；另外兄弟又和宋子文同志商量拨款 200万元给他。这是 9 月 20 日以后的事。如果他和我们诚意合作，当然不会发生别项问题的 雒知到 10月 1 日就出了一件重大变故：陈炯明的代表张识万这天来见朱益之同志，直说现在的事体陈兢公早和熊锦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